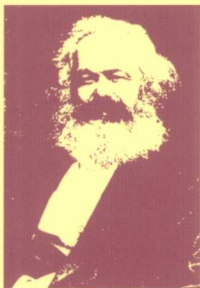




# 20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历程



The Journ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陈学明◎主编

**第四卷** 20世纪末21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面复兴与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新发展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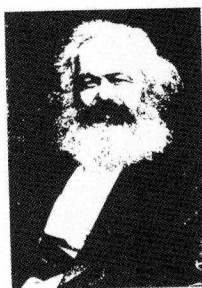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013029809

B089.1  
60  
V4



# 20世纪 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历程



The Journey of the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陈学明◎主编

**第四卷** 20世纪末21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面复兴与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新发展



北航

C1635504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B089.1  
60  
V4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 第 4 卷,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面复兴与各种马克思主义  
哲学流派的新发展 / 陈学明主编. — 天津: 天津人  
民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201 - 07873 - 1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 - 研究  
- 20 世纪 IV. ①B08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77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s@126.com](mailto:tjrmc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13.5 印张 12 插页  
字数: 1920 千字 印数: 1 - 6,000  
定 价: 390.00 元(共四卷)

# 目 录

卷首语 .....	1
第一章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成了西方最具影响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流派 .....	32
第一节 福斯特对马克思哲学生态意蕴的揭示 .....	33
第二节 奥康纳用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当代价值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 现实性 .....	109
第三节 佩珀提出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的生态 理论 .....	131
第四节 柏格特重构马克思自然、社会和环境危机等思想的内在 关联 .....	158
第二章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等影响下的新发展 .....	189
第一节 亨尼西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话语理论 .....	189
第二节 兰德里、麦克林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与 学术研究之意义 .....	201
第三节 凯瑟琳·吉布森与朱莉·格雷汉姆从“女性主义马克思 主义”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	215
第三章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否定性研究 .....	226
第一节 拉克劳和莫菲论接合与意识形态的自主性 .....	230
第二节 拉克劳、莫菲从意识形态的“哥白尼式革命”到后现代 主义 .....	237
第三节 拉克劳、莫菲走向“后马克思主义” .....	244
第四节 拉克劳、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 .....	264
第五节 拉克劳、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概念 .....	270
第六节 拉克劳、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 .....	280
第四章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	297

第一节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及多元正义构想 .....	298
第二节	维尔默的政治伦理学构想 .....	314
第三节	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	333
第四节	哈贝马斯在苏东剧变后的新反思 .....	345
<b>第五章</b>	<b>当今英、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角度、全方位的新进展 .....</b>	<b>375</b>
第一节	穆泽利斯围绕着经济还原论所展开的研究 .....	376
第二节	伊格尔顿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所展开的研究 .....	389
第三节	奥尔曼围绕着辩证法所展开的研究 .....	397
第四节	哈特围绕着“新帝国”问题所展开的研究 .....	403
第五节	哈维的马克思主义新地理学 .....	435
<b>第六章</b>	<b>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及其他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新探索 .....</b>	<b>443</b>
第一节	拉比卡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现实问题作出了独特的 贡献 .....	445
第二节	戴克西埃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和“自然”概念的 探讨 .....	453
第三节	比岱企图为马克思主义“重新奠基” .....	465
第四节	鲍德里亚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叛 .....	476
第五节	巴迪欧从其主体概念所引出的激进的共产主义观 .....	489
<b>参考文献</b>	.....	<b>500</b>
<b>索引</b>	.....	<b>530</b>
<b>后记</b>	.....	<b>597</b>

## 卷首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仅原先西方的共产党,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也都程度不等地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度陷于“沉寂”。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反对者、诋毁者,可能都未曾想到,这种“沉寂”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自9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事实已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学者所宣称、所希望的那样“行将销声匿迹”,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好”。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以一种空前的影响力在“复兴”。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城市接连不断地召开,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的相继推出,则是这种“复兴”的主要标志。正是在这“复兴”的过程中,原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甚至还涌现了一些新的派别。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缓,反而呈方兴未艾之势。特别是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被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以前的那种研究。当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论是其研究的特点、主题、趋势,还是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都相异于从前。当然,我们不能把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整个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割裂开来,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走向21世纪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20世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这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西方世界原先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苏东剧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当属“生态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并没有给“生态马克思主义”带来多少负面影响,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在实际作用方面,其发展势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扫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各种疑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人甚至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视为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的主要标志,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当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苏东剧变后非但没有走下坡路相反还大步前进,这与它所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最近几十年,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地出现在人类面前,解决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生态问题作为研究主题,而且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作为出发点,从而比其他任何生态主义派别都更具有吸引力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自然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有利条件。“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建树一方面在于,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全面推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比起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要求,更为完整、成熟,已不像以前那样还或多或少接受生态运动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理想。

美国《每月评论》杂志主编福斯特,是当代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揭示,以及以他所展示的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为武器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福斯特坚持认为只有唯物主义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理论资源,他再三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这种生态观直接导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福斯特通过分析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土地论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鲁道夫·蒙特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蒲鲁东“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

判,来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歷史观也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主要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之中。福斯特也正是通过剖析这些著作来揭示马克思的以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这构成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一个出发点。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一些核心理论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形成,这就是:所有生态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城乡对立的解决乃是超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而要消除城乡对立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研究集中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的研究,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新陈代谢”理论完整地论述了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以及解决途径。福斯特并不满足于通过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原则地说明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依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具体地阐述了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究竟是如何展开的,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如何按照其“内在逻辑”破坏生态环境这一点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当代美国另一位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主要从“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自然”这三个方面具体揭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总的来说已为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现在需要做的是将其完善和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撇开它另外建立一门什么生态科学,凡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而另外再构建什么生态科学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义首先在于它为正确地回答有关自然危机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在他看来,马克思论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所使用的方法既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伪科学的观点”,也相异于后现代主义的“混乱观点”,而且要比当今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所流行的那些方法“更具全面性和实践性”。他通过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研究生态问题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资本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既把自然界当做“水龙头”,又把自然界当做“污水池”;其二,工人在遭到经济剥削的同时,又蒙受生物学维度上的剥削;其三,资本主义积累既会面临内在的经济障碍,又会受阻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性障碍。奥康纳指出,人们



只知道在马克思那里有对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分析,实际上还有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分析,尽管后者与前者相比显得不是那么充分和系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不仅使人们看到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生产过剩的问题,更存在着生产不足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正从需求的角度冲击着资本,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则从成本的角度向资本发出挑战。他强调,马克思的学说的生态意蕴不仅表现于使我们能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体现在帮助我们真正把握社会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在阐述马克思的资本与生态矛盾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从生态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奥康纳认为,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为社会化形式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走向社会化,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实际上,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条件的“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即生产条件日益走向公共化和社会化,也会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佩珀指出,尽管不能认为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流派,但无疑,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虽然比较含蓄但颇具意义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由于劳动者和自然都受阶级统治的剥削,从而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自然都能随着从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获取自由”,所以他们必然有一个“明确的生态立场”。他提出,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在佩珀看来,在马克思那里,生态矛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第一大矛盾即经济矛盾一样,都可以用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来解释。按照马克思基于“抽象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需要不断扩大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过度生产”,而“过度生产”一方面破坏了其自身的市场,另一方面则直接损害了生态环境。佩珀研究了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环境的论述,认为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为什么资本主义“内在地对环境不友好”。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追求不断增长的动力机制,资本主义要为满足日益扩展的市场提供足够多的商品,这种扩展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消费不加以扩展的话,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中就无法生存与立足,而随着消费的扩展,对资源的使用也必然日益增长。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与环境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增加资本积累”这一铁的规律。当然,对资本主义制度

来说,使利润日益增长、资本不断扩大是必要的,但对于自然和环境来说,将必然导致灾难。佩珀指出,当今许多人都在做关于“绿色资本主义的梦”,而马克思主义对自然与环境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的研究,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本外在化”的研究,表明这只能是一种“梦呓”而已,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绿色资本主义”的。

美国的另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柏格特的主旨在于重构马克思的自然、社会和环境危机等方面思想的内在关联。在柏格特看来,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和资本的讨论,从理论上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把自然还原为资本积累的条件这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揭示了工人阶级斗争和大众环境斗争之间具有根本性的“亲缘关系”。因此,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实践意义的社会生态学的阶级分析模式。柏格特把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不仅作为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作为研究重点。他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自然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格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科学在研究人类资本主义生产时,应该突出的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剥离而不是二者的同一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如一些生态思想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在欢呼人类控制自然的胜利。柏格特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包含有一个环境危机理论,并且马克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两类环境危机:其一,资本积累危机,这类危机源于资本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原料生产规律之间的不平衡;其二,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方面更一般性的危机,这类危机源于物质和生命力量的循环出现了紊乱,这种紊乱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工业分工造成的。后一类危机主要着眼于作为人类发展之条件的自然的被剥蚀。柏格特强调指出,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危机中的内在部分,而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决定的,即为利润而生产与为人类需要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危机则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发展到顶峰时的表现和状态。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把自然理解为有无限的资源可资利用,并且主张人控制自然的反生态的伦理观。柏格特认为,马克思不可能把人的未来发展观简单地归结为,扩展和完善资本主义的已高度发达的反生态的技术,去实现自由时间和大众消费的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展望了一个物质上丰富的人—自然关系和人—人的关系的图景,这个图景是亲生态的。

## 二

“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另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的飞速发展同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明显受到文化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后现代特征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西方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活”,正是在后现代主义强劲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因此这种“复活”不能不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能不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印记。“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英语系教授亨尼西,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亨尼西看来,要充分理解女性主义关于如何理解妇女生活的物质性的争论,必须关注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因为它是当今西方学院派女性主义的主流话语。亨尼西提出,在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挑战相伴随:一方面,女性主义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妇女受剥削与压迫的社会结构分析;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提出挑战,形成了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不同名称,表明它们不同的强调重点或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但所有这些概念都表明女性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亨尼西尽管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不赞同后现代主义拒绝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系统分析的观点,而主张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必须既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进行批判,因为妇女的生活时刻受世界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影响,又强调考察妇女之间的差异。亨尼西吸收了福柯、拉克劳、莫菲等人的思想。在她看来,福柯与拉克劳、莫菲的两种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关于社会分析的方式,对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阐释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语言理解的立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拓展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努力。在亨尼西看来,新妇女、新历史具有以下内容:第一,妇女的历史,并不是要用妇女主体的编年史代替男性主体的编年史,

而是把冲突、歧义、悲剧恢复为历史过程的中心,把“妇女”作为新领导秩序中的关键人物;第二,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点从“性别”转向差异,女性主义历史把差异当做历史过程的中心;第三,把历史阅读为意识形态,历史作为一种文化叙述总是对现实的干预;第四,明确女性主义历史与女性主义理论、身份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阅读新妇女历史。

当代“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英国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英语文学系教授兰德里和英国约克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麦克林,合著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等著作,就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内容与特征,以及对女性主义政治与学术研究之意义展开了详尽的论述。兰德里与麦克林在追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概括,同时也对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她们高度赞赏一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相遇。兰德里与麦克林提出了反对“女性主义的商品化”的问题,认为“女性主义的制度化”与“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密切相关,简单地反对“女性主义的商品化”是没有用的,文化发展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使包括妇女在内的一切商品化了。兰德里与麦克林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理论,指出了“女性主义的商品化”在于其均质化与统一性。在她们看来,“女性主义的商品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把女性主义或妇女研究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一个领域、一种畅销理论或学术观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兰德里与麦克林认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使得唯物主义能够比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更相容,因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影响下产生的研究女性问题的方法或思潮。在她们看来,“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优点就在于强调了话语、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接受了“解构”的观点等这些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立场。兰德里和麦克林揭示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之所在:“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阶级矛盾和阶级分析为中心,并尝试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对性别压迫的分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除了阶级矛盾之外,还有性别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浸透于包括种族、性行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的各种矛盾。

苏东剧变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她们所推出的众多的评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中,199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

批判》一书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该书由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凯瑟琳·吉布森与朱莉·格雷汉姆两位“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合作撰写而成,以J. K. 吉布森-格雷汉姆署名出版。在她们看来,当今包括一些左翼思想家在内的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不得要领的,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得改变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她们认为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吸收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策略”,实际上她们主要使用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多元决定论的方法。

她们把全球化比喻为“男人对女人的强奸”,即资本主义或它的代理者——跨国公司这一“男性”,对并非完全资本主义的经济或领域这一“女性”的强奸。她们认为,按照这一比喻,全球化的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作为被强奸方的非资本主义的“另类”是无法抗拒这一过程的,而只能把资本主义全球化当做一种事实接受下来,把通过资本流动形式推进的全球化当做对国家和地区的帮助接受下来。只要把全球化语言与强奸语言作一比较,就不难认清全球化的本质,因为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许多明显的联系。她们提出作为被强奸方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不一定是弱者。她们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论点,而这两个论点才真正是她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特的分析:其一,受害者不一定是弱者,受害者有着自己的优势,从而可以作出相应的反抗,也就是说,只要非资本主义经济方不把自己定格于“弱者”的角色,那资本主义经济方的虚弱本质就会显示出来;其二,受害者不一定是被动者,受害者可以主动地对受害的过程进行调控,一方面把受害的程度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把受害转化为受益,这就是说,实施资本主义全球化对非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意味着灾难和死亡,但只要后者握有主动权,其最终结果未必如此。

她们企图构建“新的两性关系范本”。在传统的强奸范本中,女性作为受害者的主体地位之所以建立起来,不只是因为强奸者的力量和强暴,而且是因为强奸范本在它形成过程中所利用的关于女性性认同的学说,即把女性确认为是“需要渗透和安慰的黑暗世界”。因此,她们要推倒这一强奸范本,即要对男性性认同的学说发出挑战。由此出发,她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机体的虚弱性作出了尖锐的抨击。在她们看来,揭露了作为强奸主体的男性和全球化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虚弱性以后,一种替代传统的强奸范本和全球化范本的新的范本的轮廓就大致形成了。构成这种新的范本的大致轮廓使强调行为的双方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不仅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渗透,资本主义经济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而且

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非常清楚,她们所要提出的新的全球化范本就是强调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且为多样化的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

### 三

探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不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广为流传,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遭到了空前的扭曲与损害。“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在西方学术界出现,经过十余年的孕育,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以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终于形成了一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它的理论先驱一开始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结束和西方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出现,部分新左派理论家开始以多种方式解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并对意识形态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论证,这一趋向和后现代思想的一些成果的嫁接,使“后马克思主义”以积极的理论建构姿态呈现。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它内含许多派别,我们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所探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都可以归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些流派和代表人物成分复杂、政治态度各异、观点纷繁,但至少都具有下述共同特点: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具有与后现代主义相一致的批判精神;信奉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强调话语世界,把一切视为语言的符号系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从哲学渊源上看,这些流派和代表人物都以批判解释学、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主要依托。从狭义看,“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英国新左派理论家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后继性使用以及概念化阐释过程中,英国新左派理论家拉克劳与莫菲的著述最引人注目,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左翼、右翼及中间阵营中均激起了持续不断的理论争鸣和探讨热潮;其影响领域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美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语言学等

诸多学科。拉克劳与莫菲被公认为西方世界“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最典型的代表。

拉克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中,通过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着力阐述了一种意识形态“接合理论”。正是这一接合理论为拉克劳带来了最初的学术名声,并确立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作为欧洲新左派理论家的地位。拉克劳的接合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某一历史性意识形态包含着异质的多种原素,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原素并不一定都必然地具有阶级属性,其中有些原素根本是非阶级性的、中立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不是由主体在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地位所预先规定的,它取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原素之间的连接方式,这种赋予意识形态以统一性的连接方式就是拉克劳所指称的“接合”。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分析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原素在相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某种中性的意识形态因素最终被接合进何种阶级话语之中完全取决于“霸权斗争”。显然,这一接合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完成了一次“逆转”:社会力量或团体并非由客观的经济条件建构其统一性,然后才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实际情形则正好相反。

拉克劳与莫菲自认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实现了“哥白尼式革命”,而他们说“哥白尼式革命”涉及对既定关系的颠覆:在康德那里,认识主体并不是客体的反映,相反,认识的客体倒是主体建构的结果,因为知识可能的条件也就是认识对象可能的条件;而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不是“经济的最终决定”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抑或是什么“历史规律的担保”决定了此一主体的霸权,相反,是霸权接合实践活动本身建构了主体的霸权身份,因为霸权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历史性的政治主体可能的条件。即使仍然谈论“阶级”,也不是“阶级”决定“霸权”,而是“霸权”决定“阶级”。一如他们所言,霸权概念比阶级更具基础性,因为阶级的位置性在政治主体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存在于社会既定历史时刻的霸权类型。对霸权的这种阐述当然“超越了葛兰西”,正因为这一“超越”,葛兰西一下子从一个反还原论的斗士变成了还原论的残余分子。其实,葛兰西并没有变,他始终是那个葛兰西,真正改变的倒是拉克劳与莫菲自己。

援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洞见,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度解构,同时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建构,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1985年)一书中所要成就的事业。在解构的维度

上,拉克劳与莫菲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一消解,悉数抛进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垃圾箱。而在建构的维度上,拉克劳与莫菲引入了独特的话语理论、阐发一种新颖的对抗观念,论述了霸权性的政治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至此,他们如果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基本命题弃置一边之后却仍坚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则既不称己意又难以自圆其说,那么他们就干脆取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后”(post)字之意,以此一“后”(post)置于“马克思主义”(Marxism)之前,成就一种奇特的叫做“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东西。在拉克劳与莫菲这里,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外乎是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称和缩写。换言之,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带“后”字头的马克思主义,即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施以“后化”(Posting)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从来没有妄言自己那里还有很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业已把传统马克思主义清除得一干二净,更不承认他们除了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付出真正有所成就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他们所说的作出的努力之一就是建立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他们的话语理论的基本预设是:所有对象与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而意义是由特定的规则体系历史地建构起来的。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措辞来表达就是:意义乃是“接合”的产物,之所以是接合,是因为任何意义都具有关系性特征,即便是单个的语词,其本身也无非是能指和所指“合成”的关系性结构。接合就是把诸多原素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暂时的意义统一体的过程:接合既是差异性的连接,又是新认同的缔造。换言之,在对差异性原素进行连接的过程中,原素原先的“身份”不知不觉中被篡改了,而新的认同恰恰就建基于这种篡改之中。拉克劳与莫菲在对话语概念进行界定之前,先以“社会形态与多元决定”为题,对阿尔都塞主义以及赫斯特、辛德斯等人对阿尔都塞的批判展开了批判,这一“双重批判”的宗旨在于,既抛弃“总体的本质主义”,同时又避免陷入“原素的本质主义”。

拉克劳与莫菲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所作出的另一方面的努力是,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概念。他们提出,哪里有认同,哪里就有对抗;对抗伴随着主体认同的始末。对抗的“不可排除性”宛如矛盾的“普遍性”,然而对抗不同于矛盾,“矛盾也不必然意味着对抗关系”。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他们借科莱蒂之口引出康德关于“现实对立”与“逻



辑矛盾”的区分,以说明矛盾并不存在于一切领域之中——矛盾出现于命题领域,而对立则出现于现实的对象领域。然后他们又说,对立只能描述现实的对象领域中已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而在现实领域中,还有大量未完成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独特的关系只能用“对抗”来命名。对抗既不同于矛盾也不同于对立:对立表示两个现实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矛盾表示两个概念化客体之间的客观关系,而对抗表示的是两个没有最终定形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拉克劳与莫菲的对抗理论主要是想要说明这一点:对抗并不必然在单一点上发生,也不必然源于某一内在关系,而是由外在的否定所构成。易言之,主体认同并不是由必然性逻辑所规定的,而是建立在外在的、偶然性的关系中。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并不必然发生在生产场所,并且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在所固有的,而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与外在于它的主体认同之间。对抗的外在构成必然导致反抗的共识不可能在种种反抗的内在性中去寻求。必须从限制之外(即界限之外)理解限制本身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或者说,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总体必须是在“特殊性本身的内在逻辑之外运行的一种接合”。

拉克劳与莫菲为“重建一种特别类型的解放规划”所作出的还有一方面的努力则是建构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他们所说的“霸权”是与“普遍性”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每一种普遍性都是一个战场,谁来填充这一空位,谁将是这一空位的“霸主”。作为空的能指的普遍性与作为普遍性之替身的特殊性必然导出“霸权”概念。霸权是一个“转喻”:就像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谋求霸主地位而大动干戈一样,相异的特殊性为了普遍性的“名分”而你争我夺。“霸权”总是意味着“占有”本来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多少带有超出应有的权力界线、向外部延展势力、扩展控制范围之意。他们强调,确立霸权,就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构一种特别的普遍性。普遍性的建构不是通过肯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否定的方式,并且这种否定不是可以纳入理性调节体系中的纯粹否定性。正是这种构造方式的特别性,成就了特别的普遍性形态:不是差异性原素本身具有共同的肯定性内容成为共同体的聚合剂,而是由于这些彼此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原素遭受到了共同的否定(或排斥)才形成了一种否定性认同。拉克劳与莫菲挪用后现代主义的资源对来自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霸权”概念进行了重构,“霸权”俨然就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名词。从多元决定、接合、话语,到主体认同、对抗、等同与差异、普遍与特殊,再到错位、空的能指、异质性,这一系列关键词被用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层面来描述、界说同一个